

德都蒙古历史考论
上

青格力斯琴夫编

民族出版社



察罕哈

札薩克台
吉集元吉

呼圖呼
哩希爾
格

青海

貝子喇特

貝子喇特
納奔弟
原牧
札薩克台
吉槍後
受
蘭
烏

阿哩克
渾布他爾
槍後
此

青格力斯琴夫編

民族出版社

(青海)蒙古历史文化丛书(一)

斯琴夫 青格力 僧格 执行主编 青格力 僧格

都蒙古历史考论上

目 录

(下册)

第三编 族群、迁徙与地域关系

17 世纪卫拉特南迁原因再探讨

——兼论游牧社会“集中与分散”机制 / 青格力	317
和硕特蒙古南迁藏区述论 / 王力 张荣焕	331
17 世纪中后期的卫拉特与河西走廊 / 青格力	342
和硕特部南征康区及其对川滇边藏区的影响 / 赵心愚	374
青海蒙藏部落地域变迁 / 朱普选	387
清代中期青海藏族“北迁”述论 / 吕德胜	404
19 世纪末环青海湖及柴达木地区的藏蒙人口	
——以柔克义考察文献为中心 / 妥超群 刘铁程	413
托茂及其族源考证 / 杨德亮	428
倒淌河蒙古村蒙古族族源考 / 周全福	438
倒淌河蒙古村历史及现状之调查分析 / 马育青	444
《甘肃省彩绘山水画舆地图》初探 / 李新贵 白鸿叶	449
藏北及霍尔三十九族蒙古部落史略 / 洛布扎西	466
藏北达木蒙古再探 / 阿音娜	484



第四编 德都蒙古与清朝统治制度

清朝统治青海蒙藏民族的政策及其演变 / 戴燕	501
清代青海的盟旗制度与蒙古族社会的衰败 / 杜常顺	513
青海蒙古族盟旗制度研究 / 朱普选	525
年羹尧在雍正朝初期治藏政策孕育过程中的作用 / 邓锐龄	536
简论清朝初年对青海蒙古的政策 / 牛海桢 李晓英	557
试析旗制对青海蒙古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 徐蕴	567
青海河南蒙古盟旗制度论略 / 艾丽曼	576
青海厄鲁特蒙古各部传承和札萨克世袭 / 才让	585
清代青海蒙旗人口与经济问题探析 / 杜常顺	610
蒙古和硕特部青海黄河南前首旗亲王世系述略 / 曲又新	620
20 世纪前期蒙古南左末旗	
——群科扎萨旗的历史变迁 / 南文渊	633
藏族史料中的青海和硕特蒙古	
——黄河南前首旗亲王史略 / 丹曲	649

第五编 宗教、经济生活与社会秩序

和硕特蒙古与明末清初甘青地区格鲁派	
寺院势力的扩张 / 戴燕 杜常顺	663
青海蒙古和硕特部王族高僧堪布诺门罕考略 / 扎扎	677
青海蒙古会盟祭海制度述略 / 艾丽曼	687
肃北蒙古人的宗教信仰特征 / 特木尔巴根	695
社会转型期青海蒙古族法律和信仰价值观的	
调查与分析 / 韩官却加	703

蒙回信仰春秋

——托茂人伊斯兰信仰的历史与现状调查 / 杨德亮	715
20 世纪前期青海湖地区蒙古族的宗教信仰 / 南文渊	723
青海蒙古社会性质浅析 / 博·恭博策仁	731
《青海卫拉特联盟法典》的形成及其“后记”考释 / 青格力	738
青海蒙古族的村规民约 / 额定其劳	753
后 记	760

第三编 族群、迁徙与地域关系

17 世纪卫拉特南迁原因再探讨

——兼论游牧社会“集中与分散”机制

青格力*

清崇德二年（1637 年）初，四卫拉特联盟远征青海，消灭了喀尔喀部绰克图台吉（*čoytu tayiji*，1581—1637 年）势力。崇德二年至四年（1637—1639 年）间，大批卫拉特人自准噶尔故地迁居青海，将 16 世纪初以来由东蒙古势力所控制的青海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成为青海卫拉特。这一历史事件可称之为“卫拉特南迁”。但卫拉特的南迁活动并没有就此结束。崇德四年（1639 年），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güüsi qayan*，1582—1654 年）率青海卫拉特联军进攻东部藏区，崇德五年（1640 年）末消灭康区（*khams*）统治者白利土司，征服了多康六岗（*mdo khams sgang drug*）。崇德六年（1641 年），固始汗继续挺进西藏本土打击后藏王，次年年初推翻藏巴汗（*gtsang rgyal*）王朝，固始汗被推举为全藏区之王。新藏王随即颁布新法，重新划分西藏宗教、政治区域，任命格鲁派（*dge legs pa*，也称甘丹派或黄教派）行政长官第巴索南群培（*bsod nams chos' phels*，1595—1658 年）为摄政，确立了格鲁派在西藏宗教和世俗社会中的统治地位。青、康、藏三地的游牧地区被青海卫拉特蒙古诸首领瓜分。至此，17 世纪中叶卫拉特蒙古的南迁或向南扩展才告一段落。

众所周知，卫拉特蒙古南迁的规模较大，影响范围很广。它不仅涉及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对中亚和北亚的历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卫拉特蒙古南迁的历史原因或目的，文献记载不尽相同，学术界也有多种观

* 青格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点。主要的观点有：一是对西藏格鲁派军事援助要求的呼应——“宗教理由说”；二是卫拉特各部相互争斗、相互排挤——“内部矛盾说”；三是畜群数量的增长与牧场缩小——“草畜矛盾说”；等等。更多的人则采取一种稳妥的方法，即把三者都看作是南迁的诸要素。^①但是，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在史料学方面存在诸多疑点；第二种观点与当时四卫拉特的实际政治状况不甚吻合；第三种观点也没能完全解释出游牧经济与社会结构、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迁徙所起的作用。所以，即使三种观点相互补充，仍不能说明其本质。本文拟将分别指出上述观点所存在的问题，重新探讨卫拉特南迁的历史原因，提出并简要阐释游牧社会“集中与分散”的基本机制。

① 在分析迁徙的主要因素时，学者间所强调的侧重面也有所不同。马汝珩的《顾实汗》（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249～2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卢明辉的《清代蒙古史》（19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马大正、蔡家艺的《卫拉特蒙古是入门》（13～14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准噶尔史略》（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马汝珩、马大正《顾实汗生平述略》（《厄鲁特蒙古史论集》，6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等，视准噶尔部（绰罗斯）强盛而导致内部矛盾为主要原因。若松宽撰写的《准噶尔汗国的形成过程》（《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25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俄文史料中所见之顾实汗事迹》（《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148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等一系列文章，认为这一迁徙的操纵者为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卫拉特蒙古简史》（51～56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矢野仁一的《近代支那史》（1925年版第66～67页）等，则认为固始汗因不甘心其从属地位而迁徙，另开辟新天地。半一之的《青海蒙古在蒙古史研究中的共性的几个问题》（《蒙古史研究·第2集》，90页，1986），强调了内部纷争和宗教集团内的斗争因素。陈庆英的《固始汗和格鲁派在西藏统治的建立和巩固》[《中国藏学》，2008（1），73页]，认为内乱与外患交替的情况下，固始汗谋求本部的生存和发展。宫胁淳子《17世紀のオイラト——〈ジュン・ガル・ハーン国〉に対する疑問——》（《史学杂志》90～10，1981年第55页），认为优良的牧场以及通往西藏的要道等因素成为卫拉特占据青海的原因。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马曼丽译，1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Borjigidai oyunbilig, qoşud kökenayur-tu negügsen-ü uçir（mongyol-un sudulul-un ügülel-ün sungyumal, öbür mongyol-un arad-un keblel-ün qoriy-a，1989，pp.277～305）等，认为摆脱畜群数量增加、封地分割造成牧场缩小的困境为迁徙的主要原因。Namsarai, dörben oyirad-un teüke（öbür mongyol-un arad-un keblel-ün qoriy-a，1992，pp.40-41），Badai等，dörben oyirad-un qolbu-y-a（oyirad teüken surbulji biçig, öbür mongyol-un soyol-un keblel-ün qoriy-a，1985，pp.92～93）等，则强调了宗教因素。

一、宗教理由说

这一观点多见于佛教史文献中。认为，格鲁派特别是五世达赖喇嘛受到噶玛派施主藏巴汗等的威胁，被迫遣使向卫拉特求援。经和硕特首领固始汗亲自查实后，卫拉特决定出兵保护格鲁派，打击其敌人。在此过程中，卫拉特人迁居至青海。按此观点，卫拉特南迁完全是以保护西藏格鲁派为目的的军事行动。故此，整个南迁的原因、过程以及此后的历史发展均围绕着宗教而展开的。有关遣使求援及出兵过程的记载，最早见于18世纪蒙古高僧益希班觉（sum pa mkhan po ye shes dpal' byor, 1704—1788年）所撰《如意宝树史》（1748年成书）^①和《青海史》（1786年成书）^②，之后的蒙藏史书基本承袭了这一记载。一代高僧益希班觉学识渊博，精通蒙藏历史文化，著述甚丰。他很重视历史材料，同时也注意参考历史传说，其著作一直被后世所重视。但他也不可能避免地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他的《如意宝树史》和《青海史》成书于18世纪中叶，甚至更晚一些，书中史料有采自前人著作的，也有得自耳闻之传说的，毕竟不是第一手史料，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史料学方面的分析和考证。通过分析考证，笔者发现其有关卫拉特南迁的记述存在诸多疑点，故而对其中有些记载的可信度不无疑问。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共谋”的问题

益希班觉称，喀尔喀绰克图台吉、察哈尔林丹汗（legden qaan, 1604—1634年在位）和后藏藏巴汗噶玛丹迥旺波（karma bstan skyong dbang po, 1606—1642年）等“共谋”，企图消灭格鲁派。为此，绰克图台吉南进青海消灭了土默特势力，又与白利土司顿月多吉（be ri don yod rdo rje）一道对格鲁

① chos byung dbag bsam ljon bzang ('phags yul rgya nag chen po bod dang sog yul du dam ba'i chos byung tshul dbag bsam ljon bzang zhes bya ba bzhugs so), kan su'u mi rigs dpe skrun khang, 1992.

② mtsho sngon gyi lo rgyus tshangs glu gsar snyan zhes bya ba bzhugs so . mtsho sngon mi rigs dpe skrun khang, 1982.



派进行迫害。林丹汗也准备与之合流，在征战土默特和鄂尔多斯之后，途中病死于青海黄草滩。而藏巴汗更是时刻威胁着格鲁派。危急时刻，格鲁派上层决定秘密遣使向卫拉特求援。

益希班觉著作的史料来源可能是五世达赖喇嘛著作中的几段记载。达赖喇嘛在他的《西藏王统记》（1643年成书）和《五世达赖喇嘛自传》（1682年成书）中批评林丹汗和绰克图台吉两人破坏蒙古六大部之间友好和约的恶劣行径，并提到了绰克图台吉怀有改宗道教，恶意破坏宗喀巴教法的意图等等。^①但是，达赖喇嘛并没有明确指出上述三人为了迫害格鲁派而结成同盟。研究显示，林丹汗是因女真族的介入，其征服同族部落的政治企图失败后逃往西部^②；而绰克图台吉则是因为喀尔喀诸部内部关系不睦而南迁^③。显然，他们都是政治上的失败者。在宗教方面，林丹汗是个既信奉黄教，又敬重红教（萨迦派），还和噶玛噶举派有往来的蒙古首领。他组织翻译《甘珠尔》经，兴建寺庙，曾受戒于西藏佛教不同教派，被称作“呼图克图汗”^④。绰克图台吉由于重视事实上的全藏王藏巴汗，所以自然与藏巴汗所信奉的噶玛噶举派关系也显密切，但同时又和西藏的其他教派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曾邀请并供养格鲁派施主吉雪第巴却杰丹津洛桑坚赞（skyid shod sde pa chos rjr bstan 'dzin blo bzang rgya mtsho, 1593—1638年）和佑宁寺第九任住持南杰班觉（nam rgyal dpal 'byor, 1578—

① rgyal dbang lnga pa chen mo, bod kyi deb ther dpyid kyi rgyal mo' i glu dbyangs, mi rigs dpe skrun khang, 1981, p.192;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i nam thar (za hor gyi ban de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o' i 'di snang 'khrul ba' i rol rtse d rto gs brjod kyi tshul du bkod pa du k' u la' i gos bzang las glegs bam dang po bzhugs), v.1, 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 1989, pp.154, 170.

② 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史研究》，303～307页；王雄：《察哈尔西迁的有关问题》，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9（1）；Borjigidai oyunbilig, arban doloduyar jayun-u türügü hayas-un mongyol manju “üledümel” surbuljis-ača öbür mongyol-un teüke-yi üjekü ni—nige “jou-yin baidduyan”, öbür mongyol-un yeke surγayuli-yin erdem sinjilegen-ü sedkül, 1999-3, pp.1～24.

③ 乌云毕力格：《绰克图台吉的历史和历史记忆》，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 (QMD), I, 204, Tokyo, 2005.

④ 蒙古文文献 altan kürden mingyan gegesütü（《金轮千辐》）、sir-a tuyuji（《黄册》）、erdeni-yin tobči（《蒙古源流》）、altan erike（《金鬘》）等都记载了林丹汗的宗教事迹。

1651年)二人。^①格鲁派有些史书记载诋毁绰克图台吉是信奉道教者或没有自己的信仰云云,^②实际上说明了绰克图对各个教派一视同仁的态度。在蒙古各部首领之间的政治冲突中格鲁派利益可能受到了冲击,^③但没有确切的史料能够证明林丹汗和绰克图台吉是有意排斥格鲁派,也没有史料能够表明他们像白利土司那样旗帜鲜明地打击和迫害格鲁派。^④此二人向青海地区迁徙的根本原因完全是由于他们各自的政治遭遇所致,而不是西藏的宗教问题,因此所谓的“共谋”说自然不能够成立。

(二) 派遣使者的问题

益希班觉在著作中叙述了格鲁派遣使求援的经过。但在这一计划的实际策划者为何人的问题上,《如意宝树史》、《青海史》以及其《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的叙述相互均有差异,与卫拉特史料记载也不太一致。《如意宝树史》记载策划者为格鲁派行政长官第巴(phyag mdzod de pa)索南群培和达泽第巴(stag rtse sde pa)二人。《青海史》对过程记述得相对较详细,说先由索南群培与佑宁寺籍的僧侣嘎如擦巴那钦('ga' ru lo tsa ba sna chen)和色木尼卡切(sem nyi kha che),还有甘丹寺院施主达泽第巴等人商讨,决定从两位佑宁寺僧侣中派一位秘密前往卫拉特。被派的那位使者

① tu' u bkwan blo bzang chos kyi nyi ma, bshad sgrub bstan pa' i' byung gnas chos sde chen po dgon lung byams pa gling gi dkar chag dpyod ldan yid bdang' gugs pa' i pho nya. 木刻版, 31b。

② 绰克图信奉道教的说法始于五世达赖(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i rnam thar, 1989, Vo.1, p.170)。

③ 五世达赖称林丹汗、绰克图台吉、白利土司的行为阻断了运送货物之“金桥”(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i rnam thar, 1989, Vo.1, p.154)。

④ 东嘎·洛桑赤列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写道:“青海地方原有的格鲁派的大喇嘛和僧人多遭杀害,有一些则被关入监狱。”但没有进行史料论证。根据清朝档案史料《清内阁蒙古堂档》,喀尔喀部多尔吉车臣济农在1682年给清廷的信中称绰克图台吉曾在喀尔喀袭击了曼珠席里库伦(manjusiri-yin küriyen),并在青海杀害了达吉纳呼图克图(dagina qutuytu)(dayi'ching gürün-ü dotuyadu yamun-u mongyol bi'čig-ün ger-ün dangsa, öbür mongyol-un arad-un keblel-ün qoriy-a, pp.142, 341)。袭击曼珠席里库伦,无疑是绰克图台吉与喀尔喀部之间冲突所致,并不能说是针对格鲁派的。后来准噶尔的噶尔丹也袭击了曼珠席里库伦。至于杀害德吉纳呼图克图之事,在青海安多地区主要的活佛体系史料中不见谁被绰克图台吉所迫害。名不见经传的德吉纳呼图克图可能是个土默特或喀尔喀等势力的支持者,在绰克图台吉与青海土默特的冲突中他成了无谓的牺牲者。



先回到青海，再由瓦日（dpa' ris）部落护送至卫拉特。益希班觉的《自传》却又说策划者是四世班禅洛桑却吉赞（blo bzang chos kyi rgyal mtshan, 1570—1662 年）和索南群培二人^①。卫拉特史籍《蒙古溯源史》^②则与上述记载不同，称班禅和达赖等共同派遣卫拉特人尹咱呼图克图（蒙古语：inza qutuγtu，藏语：dben sa sprul sku）^③到卫拉特求援。显然，对策划者和使者的记载均有差异。另外，这些记载似乎都表明，在向卫拉特求援的问题上，格鲁派上下立场是一致的。但是，与鄂尔多斯和土默特、永谢布等稍早控制青海的东蒙古势力鼎立支持格鲁派的状况相比，当时的卫拉特并没有显示鲜明的教派立场。在格鲁派当中，卫拉特更倾向于推崇德高望重的四世班禅喇嘛，最早入藏学佛，后成为传教高僧的卫拉特土尔扈特部人内济托音（ne 'i chi tho yon, 1557—1653 年）就师事于班禅。^④尹咱呼图克图第三世在卫拉特转世，其本寺在后藏。其次，索南琼培、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与藏巴汗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在藏巴汗与格鲁派的冲突中，四世班禅一直充当调解者的角色，^⑤五世达赖喇嘛也反对推翻藏巴汗。很难想象，在这样的状况下，上下能够取得向卫拉特求援的一致意见。况且，卫拉特能否战胜藏巴汗及其“同谋”，还是个未知数。而上述记载却非常简单地处理了当时卫拉特与西藏的关系，以及西藏政教内部复杂的矛盾背景。

① Sum pa ye shes dpal 'byor gyi rnam thar nyid kyis mdzad pa bshugs so, kan su' u mi rigs dpe skrun khang, 1997, p.3.

② Mongyul-un uy eke-yin teüke oyirad teüken surbulji bičig, öbür mongyol-un soyol-un keblel-ün qoriy-a, pp.307 ~ 308.

③ 第一世桑杰益西（sangs rgyas ye shes, 1525—1591 年），第二世益西嘉措（ye shes rgya mtsho, 1592—1604 年），第三世洛桑丹增嘉措（blo bzang bstan 'dzin rgya mtsho, 1605—1643 年，卫拉特蒙古人），第四世噶尔丹博硕克图（γaldan bošuytu, 1644—1697 年，卫拉特绰罗斯部首领）。

④ 成崇德、申晓亨译注：《内齐托音一世传》，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87 ~ 164 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⑤ 根据《四世班禅传》，班禅与藏巴汗关系良好，他并没有卷进格鲁派与藏巴汗之间的争斗中。参见罗布：《蒙、藏文文献中固实汗入藏记载的考辨》，载《清史研究》，1998（2）。

（三）固始汗秘密探访西藏的问题

《如意宝树史》称，固始汗于崇德元年（1636年）装扮成香客前往西藏，秘密调查格鲁派受迫害一事。^①又《青海史》记载，固始汗是在天聪九年（1635年）与绰克图台吉之子阿尔斯兰同往西藏。并在途中说服阿尔斯兰打消迫害格鲁派的念头，之后一同离开拉萨，不久固始汗回到卫拉特本土。^②从《五世达赖喇嘛自传》可获知，阿尔斯兰于崇德元年（1636年）正月到达拉萨后很快率军开往康区。^③根据这一史实，固始汗应在1636年正月以后离开拉萨返回本土。但《青海史》记载固始汗等人很快便率领卫拉特联军到达青海，于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在青海湖北岸擒杀了绰克图台吉。就准噶尔至西藏拉萨的行程距离而言，康熙元年（1662年）咱雅班底达急速赶往西藏时，从和硕特牧地到青海境内用了四个月多，^④从青海到拉萨少则也有近两个月的路程。^⑤据此推算，固始汗回到本土的时间最早也应在崇德元年（1636年）的五六月。那么，按《青海史》所言，固始汗自西藏回到卫拉特，向四卫拉特联盟汇报调查结果，然后联盟决定出兵，召集各部人马开到青海这些都是在1636年一年内完成的。即便固始汗的秘密调查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进行的，但上述整个过程能在同一年内完成，这在时间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俄文档案显示，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固始汗在塔尔巴哈台接见了俄罗斯使者。^⑥这样一来，固始汗在上述阶段前往西藏进行探访的可能性就很小。另外，《青海史》在叙述这一事件时采用的是“据传说”（ngag sgros shig tu）的表述方式，看来此记载中包括了不足置信的传说和附会。更值得注意的是，格鲁派派遣求援使者、固始汗的调查等卫拉特与格鲁派之间进行的这些重要的历史活

① chos 'byung dpag bsam ljon bzang, kan su' u mi rigs dpe skrun khang, p.1003.

② mtsho sngon gyi lo rgyus tshangs glu gsar snyan zhes bya ba bzhus so, p.11.

③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i rnam thar, 1989, Vo.1, p.158.

④ Zay-a bandida, öbür mongyol-un arad-un keblel-ün qoriy-a, 1990, pp. 205 ~ 210.

⑤ 有关青海至西藏的路程，佐藤长有详细研究。参见〔日〕佐藤长：《清朝における青海ラサ間の道程》，载《チベット歴史地理研究》，5～88页，岩波书店，1978。

⑥ Г.И.Слэсарчук 著，陈弘法译：《关于固始汗的俄文档案材料》，载《西北史地》，1987（4），94页。



动在五世达赖崇德八年（1643年）撰的《西藏王统记》和康熙十一年（1672年）开始编撰的《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均无记载^①。

（四）占据青海的问题

根据上述记载，格鲁派向卫拉特求救是在天聪九年（1635年），其宿敌藏巴汗被固始汗投入雅鲁藏布江是在崇德七年（1642年），军事救援行动前后竟长达7年时间。将此漫长过程统称为呼应紧急求援的行动，恐怕不符合逻辑。值得注意的是，卫拉特联军在消灭绰克图台吉以后并没有急于打击格鲁派的主要敌人藏巴汗，而是巴图尔珲台吉为首的绰罗斯左翼等部分联军撤回本土。^②崇德三年（1638年）秋巴图尔珲台吉等回到本土的时候，大批部落已经开始向青海地区迁徙了。很显然，卫拉特南进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战争，可以说，它一开始就是以向青海地区迁移部落为目的的。

（五）固始汗造访拉萨的问题

崇德二年（1637年）固始汗造访拉萨受到最高礼遇，和达赖喇嘛及其格鲁派官员进行了相互册封。^③尽管这样，此后两年间固始汗曾先后多次邀请达赖喇嘛到青海卫拉特，但始终未予答应。^④这表明这一时期以索南群培为首的甘丹政权与固始汗之间的配合并不很默契。作为青海地区的新主，固始汗可能是想通过拜访或者邀请一些教派领袖的方式，试图重新建立青藏高原的政治秩序。例如，吉雪第巴却杰丹津洛桑坚赞受固始汗邀

① 山口瑞凤的《ダライ＝ラマ五世の統治権－活仏シムカンゴンマと管領ノルブの抹殺－》（《东洋学报·73》1992年3～4页）、陈庆英的《固始汗和格鲁派在西藏统治的建立和巩固》（第73页）、罗布的《蒙、藏文献中固始汗入藏记载的考辨》（第125页）等也认为固始汗没有到过西藏。

② Mongyul-un uy eke-yin teüke.oyirad teüken surbulji bičig, öbür mongyol-un soyol-un keblel-ün qoriy-a, p.309.

③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i rnam thar, 1989, Vo.1, pp.168, 170 ~ 171.

④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i rnam thar, 1989, Vo.1, pp.155 ~ 157.

请到达了青海湖畔。^①固始汗也试图拜访康区白利土司的福田竹巴噶举派康珠活佛噶玛丹培（kham sprul rin po che karma bstan phel, 1569—1637年）。^②固始汗自己也宣称“对各个宗派并不偏袒”，与后藏的噶玛巴教主之间也有书信来往。^③总之，在攻取藏巴汗之前，固始汗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格鲁派支持者，他与格鲁派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从这次会面之后逐渐确立的。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王统记》中记载，在崇德二年（1637年）固始汗访问拉萨后，出现了“预兆一切政教事业皆趋和祥之相”，“预示藏及大藏悉将归其统御”，^④也暗示着固始汗与格鲁派之间的政治合作将要开始。

（六）固始汗进入康区和西藏本土的问题

崇德四年（1639年）年中固始汗发动康区战争，崇德六年（1641年）消灭了白利土司顿月多吉。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也消灭了盘踞康区的永谢部势力。这一支东蒙古势力虽信奉噶举（达隆噶举）派，但早已与噶举派上层决裂，和格鲁派关系很密切。^⑤他们曾被林丹汗打败，也受到绰克图台吉的攻击。^⑥固始汗消灭永谢部的举动，显然不能说是为了格鲁派的利益，只能说这是蒙古不同势力之间的斗争结果。在攻下康区后，卫拉特

① deb thar mes po' i zhal lung, 手抄本, p.184. Yon tan rgya mtsho, skyid shod sde pa' i skor, Bhutan, 2001, pp.51 ~ 57.

② [德]彼德·史卫国著,才旺南加译:《清代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小传》,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③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42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④ 原文: bstan srid mtha' dag dkar 'jam du 'gyur ba' i rten 'brel 'grig / de skabs bod dang bod chen po mtha' dag mnga' 'og tu chug pa' i mthan ltas legs pa' ng 'ga' zhig byung 'dug/ (Bod kyi deb ther dpyid kyi rgyal mo' i glu dbyangs, p.193)。

⑤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i rnam thar, 1989, Vo.1, pp. 138, 150, 158, 161, 238 ~ 239。杜齐氏则认为永谢部改信了格鲁派(李有义、邓锐龄译:《西藏中世纪史》,108 ~ 10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0)。

⑥ 有关青海永谢部的研究有和田清:《东亚史研究(蒙古编)》(东洋文库,1959年);森川哲雄:《〈アルタン=ハーン伝〉の研究》(九州大学教养部,1987年);山口瑞风:《17世纪初头的青海トゥメト》(《成田山佛教研究所纪要》16,1993年);江国真美:《青海モンゴル史の一考察》(《东洋学报》1967-3~4);若松宽:《明末内蒙古土默特人の青海地区進出——ホロチロノヤンの事跡》(《京都府立大学学術報告(人文)》37,1985年)。



军似乎准备从中部康区返回青海，但索南群培秘密要求固始汗率兵进军后藏。后藏的噶玛巴也曾赞同固始汗攻取藏巴汗。^①而对此五世达赖喇嘛反应强烈，他极力反对消灭藏巴汗，欲阻止固始汗。藏巴汗被捕后达赖喇嘛也曾派人试图保护他。^②这些都表明，卫拉特消灭绰克图台吉势力，卫拉特部落迁徙青海，固始汗进攻康区，最后深入后藏消灭藏巴汗，这些并不是为一个目的而采取的连续行动，其阶段不同，动机和目的也有所不同，应该分别进行探讨。

总之，诸多疑点和问题说明，将卫拉特南迁与格鲁派的影响力联系在一起，不过是后世格鲁派史家的自作附会罢了。所以，南迁的真正原因还需从卫拉特自身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二、内部矛盾说

内部矛盾说的基本观点认为，17世纪30年代绰罗斯部巴图尔珲台吉势力增强，欲凌驾于诸卫拉特之上。土尔扈特和和硕特等其他部落首领受到兼并和凌辱，于是不得不寻找机会离开故地。内部矛盾说的实质是政治权力斗争。所谓的准噶尔汗国的形成说便是这一观点的集中体现。^③卫拉特史料所记载固始汗与巴图尔珲台吉的矛盾，^④俄罗斯档案所记却库尔与拜巴噶斯之间的争斗，^⑤《蒙古游牧记》、《皇朝藩部要略》中的巴图尔珲

①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42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②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i rnam thar, 1989, v.1, pp.192-202.

③ 参见[苏]伊·亚·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日]若松宽：《准噶尔汗国的形成过程》，见《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3～43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④ yabang sirab-un tuyuji kemekü orusibai, oyirad teiken surbalji bičig, öbür mongγol-un soyul-un keblel-ün qoriy-a, 1985, p.253. На.Сүхбаатар, Ойрад Монголын түүхэнд холбогдох сурвалж бичгүүд 3,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1, p.123 (9a).

⑤ Златкин.И.Я.,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607—1636, Москва, 1958.